

晚清「天演」、「進化」二詞的消長*

蔣英豪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前 言

晚清時期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新思想，論到影響之深遠，恐怕要數進化論 (theory of evolution)。當時開明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受過進化思潮的洗禮，風氣所及，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種種變革，追本究源，多有進化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¹ 晚清時期騰於人口的與進化論有關的語詞，如「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競爭」、「淘汰」等，也很早便在漢語中固定下來，沿用至今。進化論像許多在晚清時期傳入中國的新事物一樣，在傳入的過程中出現過不止一個譯名，這些譯名就像進化論核心思想所倡言的那樣，最能適應當時環境的便保存下來，其餘的便難免遭到淘汰的命運。眾所周知，進化論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還曾以「天演論」之名出現，但經過其後幾年的角力，「天演論」終於把主角地位拱手讓給「進化論」，退居閒角。這兩個譯名否泰消長的過程，頗饒趣味，不單展示了中國近代詞匯發展的趨勢，也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側影，值得深入探討。

達爾文學說在日本的譯名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在1859年出版了他有關生物進化論的經典著作《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相隔十一年，在1871年，中國讀者已有機會

* 本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 (RGC) 資助的「現代漢語詞匯的創世紀——梁啟超系報刊新語詞研究」(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 Study of the New Terms in the Three Journals of Liang Qichao) 研究計劃成果，謹向該局致謝。

¹ 曹聚仁(1900–1972)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中提到，在他讀過的五百餘種回憶錄中，許多人都提到曾受嚴復譯《天演論》的影響(頁353)。參馬西尼(Federico Masini)(著)、黃河清(譯)：《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頁136。

透過 Sir Charles Lyell (雷俠兒, 1814–1893) 的 *Elements of Geology* 的中譯本《地學淺釋》接觸到達爾文的進化學說。² 1873年,《申報》刊登了一則題為〈西博士新著《人本》一書〉的書介,介紹了達爾文在1871年出版的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³ 1877年,傅蘭雅 (John Fryer, 1839–1928) 在《格致匯編》〈混沌說〉一篇中介紹了進化論:「初有之動物皆甚簡便,後始逐漸由簡而繁也,即初有者為蟲類,後漸有魚與鳥獸。獸中最靈者為大猿,猿漸化為人,蓋從賤而貴,從簡而繁也。」⁴ 由此可見,中國人接觸達爾文及其進化論,為時相當早,起碼不比日本人晚。可是這些早期的紹介相當粗淺,連進化論的核心思想「生存競爭」也沒有觸及,⁵ 看來不曾引起當時中國讀者多大的興趣,更不用說帶來震撼和影響。而在詞匯學而言,當時也不曾嘗試為這種新思想鑄造新譯名。

日本人接觸達爾文不見得比中國人早。日本文獻中較早提及生物進化的是博物學家松森胤保 (Matsumori Taneyasu, 1825–1892) 在1875年出版的《求理私言》。⁶ 1887年,美國生物學家莫斯 (Edward Morse, 1838–1925) 開始在東京大學講授生物學,力主進化論,日本人由是有機會全面地、系統地接觸到達爾文的進化學說。⁷ 井上哲次郎 (Inoue Tetsujiro, 1855–1944) 等人所編、在1881年出版的《哲學字匯》,不但列出了 evolution 的「化醇」、「進化」、「開進」、「開方」、「開明」等幾個譯名,也為進化論的主要概念詞提供了譯名,如譯 struggle 為「競爭」,譯 struggle for existence 為「生存競爭」,譯 selection 為「選擇」、「淘汰」,譯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為「適種生

² 《地學淺釋》提到:「近又有兌兒平者,言生物能各擇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時能改變。」原書未見,轉引自王中江:《進化主義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7。據王書,《地學淺釋》口譯者為瑪高溫 (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筆述者為華蘅芳 (1833–1902),是書在1871年開始刊行,至1873年出完(頁35)。雷俠兒(今譯賴爾)是對達爾文有影響力的地理學家,中譯本《地學淺釋》譯自 *Elements of Geology* 的第六版。參 James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 又參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頁72。

³ 參《進化主義在中國》,頁37。

⁴ 《格致匯編》第2年第7卷,〈混沌說〉。

⁵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p. 5. 漢文文獻中較早涉及「生存競爭」的觀念的是鍾天緯。1889年,鍾天緯在格致書院的考卷中,討論了達爾文及其學說,但他沒有提到達爾文學說之名,而於其學說之要旨,只是簡單的說「論萬物強存弱滅之理」,「不合宜者漸漸漸滅,其合宜者得以永存」。見《進化主義在中國》,頁40。參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64–66。

⁶ 《進化主義在中國》,頁50。

⁷ 同上注,頁50–51。

存」等。⁸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很早便對社會進化論情有獨鍾，他們為 evolution 提供的幾個譯名，都明顯有很強烈的「進步」、「向善」的含義。加藤弘之 (Katō Hiroyuki, 1836–1916) 在1882年著《人權新論》，便力倡社會達爾文主義，而矢田部良吉 (Yatabe Ryōkichi) 在1883年為《動物進化論》所寫的〈緒言〉中也把進化主義與社會聯繫起來。⁹ 這顯然與明治維新的大氣候有直接關係。

明治時期學者為 evolution 所提供的幾個譯名，其命名方式與他們為其他從西方傳入的新思想新學科譯名慣用的方式是相同的，即借用源自漢語的舊有語詞以譯新概念，或拼合源自漢語的現成語詞而成新詞。¹⁰ 「化醇」一詞，見於《易·繫辭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孔穎達疏云：「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¹¹ 由於語出〈繫辭〉，在古代漢語文獻中常見引用。〈繫辭〉所言，當然與達爾文的進化論完全拉不上關係，譯者只是看中了孔疏所釋的「變化而精醇」，「化」切 evolution 的「演變」之義，「醇」則射進化論的要義「適種生存」。這個譯名可算典雅精妙，唯是「化醇」二字的組合在當時易於使人聯想到化學名詞，有易致混淆之弊。「開進」、「開方」、「開明」都是古代漢語現成的語詞，據《漢語大詞典》所載，「開進」有「起用」、「啟發、促進」二義項。¹² 此詞在古漢語中頗罕用，日本人選用此詞譯 evolution，應是看中了「開」、「進」二詞的合義：開取開化之義，進取日進之義。這本也是個不錯的譯名，但由於「開」、「進」二字都是常用字，其本身的義項也多，二詞的組合，並不容易使人聯想到達爾文學說，也有易致混淆之弊。至於以「開方」譯 evolution，「方」當是取其常規、道理之義。¹³ 二字合義當是「開化之道」。但由

⁸ 《進化主義在中國》，頁54。有些學者認為井上哲次郎就是將 evolution 譯成「進化」的人。參庚鎮城：〈“Evolution”一詞譯成「進化」及其傳入中國的經過〉，《科技導報》2000年第12期，頁10。庚氏說：「他〔井上哲次郎〕將 evolution 一詞譯成『進化』，並統一地用到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裏。由於井上多年來一直是日本哲學界、人文學界和學術評論界的大權威，因而進化的譯詞一下子就被日本學術界接受了，成為定格。」其說確否待考。

⁹ 《進化主義在中國》，頁51–52。《動物進化論》原為莫斯在東京大學用英語講授生物學的筆記，其學生石川千代松把筆記譯成日文出版，東京大學生物學教授矢田部良吉為之作序。

¹⁰ 應該指出，這些進入了日語的漢語語詞，其意義是會起變化的，有別於漢語原來的詞義。

¹¹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88。

¹²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1993年），冊12，頁56。

¹³ 同上注，冊6，頁1550。

於「開方」本是個數學名詞，也易致混淆。以「開明」譯evolution，則明是取成長之義。¹⁴ 二字合義當是「開化成長」。這個譯名同樣有易致混淆之弊。日本人早期在考慮evolution的譯名時，往往從「開」入手，當是受evolution拉丁語語源有展開之意的影響。事實上，*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為evolution提供的第一個義項便是“the process of unrolling, opening out, or disengaging from an envelop”。¹⁵

「進」、「化」二字成詞，在古代漢語文獻中罕見其例。這二字的組合，進取日進之義，化取演化之義，二者的組合，較「開進」等詞更易使人聯繫到達爾文學說，特別是當時最流行的社會達爾文學說，因此終於擊敗「化醇」、「開進」等詞，成了日文中達爾文學說的標準譯詞。由此可見，「進化」作為evolution的日語定譯，它在進入中國之前，已經擊敗了好幾個對手。它在日本本來就是個適者生存的優勝者。

日本明治時期社會進化論的熱潮，對同時期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有限和間接的。黃遵憲(1848–1905)曾在明治維新時期留日四年(1877–1881)，他對日本社會和明治維新有直接和第一手的認識，但他在《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中並沒有直接提及進化論，也沒有用到與進化論有關的語詞。《日本國志》中的一些觀點誠然受到社會進化論的影響，¹⁶ 但這種影響是比較間接的，這種影響只是明治維新這個大氣候對他的影響的一個構成部份，當時黃遵憲並沒有刻意去認識或介紹達爾文主義或社會進化論。黃氏在其著作中提到達爾文學說，已是戊戌(1898)以後的事。¹⁷

日本學語與創造學語

「進化」這個譯名正式進入中文文獻，是甲午(1894)中日戰爭以後的事。令人感到弔詭的是，較早把「進化」用進中文文獻的，正是把evolution譯成「天演」而得享譯

¹⁴ 同上注，冊5，頁595。

¹⁵ 參*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evolution”條。

¹⁶ 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頁181–84。

¹⁷ 黃遵憲於1896年在天津初識嚴復，嚴復在1898年以《天演論》贈黃遵憲，黃氏對此書評價頗高。黃氏1899年作〈己亥雜詩〉，其第二十首云：「去留一一歸天擇，物自爭存我大公。」用嚴譯《天演論》「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物爭而獨存」；同年作〈己亥續懷人詩〉，其懷嚴復一首云：「一卷生花天演論。」黃氏1902年致書嚴復云：「天演論供養案頭，今三年矣。」詳見蔣英豪：《黃遵憲師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17–18。

學大家盛名的嚴復(1854–1921)。嚴復的《天演論》，譯自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的“Evolution and Ethics”(〈進化論與倫理學〉, 1893)和“Evolution and Ethics, Prolegomena”(〈進化論與倫理學導言〉, 1894)兩篇演講稿。嚴復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進化倫理說的忠實信徒，他選擇翻譯反對斯賓塞學說的赫胥黎的兩篇演講稿，是因為他認為可以借在翻譯中加按語的機會來表達對斯賓塞的支持。¹⁸ 嚴復動手翻譯，可能早至1894年，最遲也不會遲於1895年，¹⁹ 即在〈進化論與倫理學導言〉演講稿發表後不久。嚴復在動手翻譯《天演論》之前，他應該接觸過達爾文學說重要概念在日文中的譯名，但他堅持要為這種新學說的新概念建立一套完整的中文譯名系統，可見他對這種學說的各種流派深有認識，也可見其治學態度之嚴謹。²⁰ 他在《天演論·譯例言》中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確是實話。²¹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天演論》中不止一次用到「進化」一詞，但在他的譯文中，「天演」與「進化」並不是可以互換的詞，二者的涵義是不同的。例如他在〈導言一·察變〉的案語中說：「最後第五書，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條貫，而以保種進化之公例要術終焉。」²² 這裏所說的「進化」，其義為「進步發展」，是日譯「進化」一詞的引申義，也是二十世紀初年「進化」一詞常見的用法。《天演論》的最後一章〈論十七·進化〉，其涵義也是「進步發展」。²³ 可見在嚴復《天演論》的翻譯計劃中，「天演」和「進化」是兩個獨立不同的語詞，「天演」指達爾文學說，「進化」則指進步發展，儘管「進化」這個詞在當時日本已成了達爾文學說的唯一譯名。(有關「進化」、「進步」、「發展」三詞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漢語中用法相混的討論，詳見後文。)

¹⁸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02–3.

¹⁹ 王栻：〈嚴復與嚴譯名著〉，載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論嚴與嚴譯名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5。

²⁰ Lydia H. Liu (劉禾) 在 *Translingual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提及一個有趣的問題：嚴復是為了反抗日譯新詞才自創譯詞，還是他在自創譯詞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已有日本譯詞？她引用馬西尼對economy和sociology兩詞的中日譯詞的觀察，認為嚴復在提出「計學」和「群學」的譯詞之前，他不知道日本人已有「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譯詞(頁390–91)。但在「天演」與「進化」這對譯詞而言，根據外證(《天演論·譯例言》)與內證(《天演論》)，嚴復在自創「天演」這譯詞之前，他是知道日本人已有「進化」這譯詞的。詳下。

²¹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xii。

²² 同上注，頁5。

²³ 據《天演論·譯例言》，《天演論》中各篇篇目是吳汝綸所擬訂的(頁xii)。

在翻譯《天演論》之前，嚴復在1895年3月4日天津《直報》上發表了〈原強〉，開篇就介紹了達爾文和錫彭塞(斯賓塞)的學說，提到「爭自存」、「遺宜種」等說，但卻沒有言及「天演」，當然也沒有用上「進化」這詞。1896年10月，梁啟超任主筆的《時務報》擬轉載〈原強〉，梁氏函詢嚴復意見，嚴氏覆函謂擬用十餘日加以刪益，但就將《天演論》譯稿寄給《時務報》。²⁴ 嚴復後來確曾修改了〈原強〉，改動之處不少，也增加許多新內容，其中與舊稿最顯著分別是，這次他用上了「天演」這詞。²⁵ 但修改後的〈原強〉始終沒有在《時務報》刊登，只是梁啟超在《時務報》上連載的《變法通議》，自1897年4月起即不斷引用嚴譯的《天演論》，其時《天演論》的定稿本還未出版。²⁶

嚴復以「天演」譯達爾文學說的evolution，顯示了他對達爾文學說的理解與掌握，以及他對日本學界以「進化」譯evolution的不滿。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刻意避開evolution，而說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或譯作「伴有後天變異的世代傳承」²⁷)；「天演」一詞正是但有演變之義而無與於價值判斷。「天」、「演」二字成詞，在古代漢語文獻中未見其例。嚴氏選用「天」字，沿用先秦諸子言自然之義。²⁸ 「演」，《說文解字》釋為「長流」，²⁹ 引申為發展變化之義。二字成詞，義取自然變化，本身並無價值判斷，與「進化」之有強烈的「進步」、「開化」的肯定的涵義，是大異其趣的。「天演」消而「進化」長，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會覺得有「劣幣驅逐良幣」的意味。問題就在於：劣幣何以能驅逐良幣？劣幣是在怎樣的時勢環境底下驅逐良幣的？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又是怎樣的？

²⁴ 嚴復：〈致梁卓如書〉，載牛仰山等(編)：《嚴復研究資料》(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115。

²⁵ 〈原強〉修訂稿收入熊元鏜(編)：《侯官嚴氏叢刻》，南昌讀有用書齋1901年木刻本；又見王枋(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一冊，頁15-32。

²⁶ 《天演論》的出版日期值得一提。其定稿1898年6月(本文所用月、日均為西曆，下同)由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木刻出版，時在戊戌政變之前；同年11月由天津嗜奇精社石印出版，時在戊戌政變之後。在定稿出版前，早在1895年，陝西味經售書處已有《天演論》的「重刊本」，惟此本無自序、吳序及譯例言。參《嚴復研究資料》，頁464-65。按嚴氏譯《天演論》自序寫於1896年10月15日(光緒丙申重九)，譯例言寫於1898年6月3日(戊戌四月二十二日)。在1895年刊本與1898年定本之間，《天演論》經歷了漫長的修改過程，《嚴復集》第五冊所載的《天演論》手稿，即1896年到1897年之間的修改稿。其間接觸過稿本的人不少，如梁啟超即是。

²⁷ 庚鎮城在〈“Evolution”一詞譯成「進化」及其傳入中國的經過〉一文中的譯法(頁9)。

²⁸ 成玄英疏《莊子·大宗師》「知天之所為」句云：「天者，自然之謂。」見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24。

²⁹ 許慎：《說文解字》(香港：太平書局，1969年)，卷一一上，頁229。

天演與進化的較量

要觀察晚清時期「天演」、「進化」二詞詞義的發展、變化及二詞間的消長，最佳的平台莫過於1896年至1907年出版、與梁啟超(1873–1929)有直接關係的三個在近代史上很暢銷並發揮過非凡影響的報刊，即《時務報》、《清議報》與《新民叢報》。

《時務報》創刊於1896年8月，屬旬刊，十日出版一冊，每冊約三萬字，梁啟超任主筆，並負責主要編務。其讀者對象為各層官員與知識份子，在當時很暢銷，早期印售四千份，半年後增至七千份，一年後增至一萬三千份，最高峰時期銷售一萬七千份，影響至廣。³⁰此報在1898年8月停刊，一共出版了六十九冊。

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日本，1898年12月在橫濱刊行《清議報》，也屬旬刊，梁氏負責實際編務和筆政，因日本政府的協助得以傳銷到中國各地，每期銷行三四千份，³¹繼續在中國發揮改良派喉舌的功能。1901年12月，《清議報》出至一百期，即因報館火災停刊。

《新民叢報》於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橫濱創刊，距《清議報》停刊僅兩個月。實際的編輯和主筆仍是梁啟超。《新民叢報》是半月刊。其正式印數，高峰期有一萬四千份，在中國內地有近百個發行點，遍布各大城市，而且有為數甚眾的翻刻本出現，其讀者網非常龐大。³²《新民叢報》一共出版了九十六號，至1907年11月才停刊。

我選用這三個刊物作為觀察晚清「天演」、「進化」二詞消長的平台，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 一、這三個刊物出版的十二年間，是中國近代新思潮傳入的高峰期，也是新詞出現的高峰期；
- 二、這三個刊物在當時銷路甚廣，影響力甚大，是新詞流傳的最佳媒體，也為同義而異詞的新詞提供角力較勁的場所；
- 三、梁啟超對「天演」和「進化」都有最親密的接觸。在《天演論》定本出版前，他已細讀了嚴氏的稿本；³³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他更有機會在「進化」譯詞的來源地細心考察；

³⁰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83。

³¹ 同上注，頁184。

³² 黃敏蘭：《梁啟超》(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98。

³³ 嚴氏在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木刻版《譯例言》中列有梁啟超之名，但在天津嗜奇精社石印版中則刪去「新會梁任父」字樣。見東爾(編)：《嚴復生平、著譯大事年表》，載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59，166。嚴氏此舉當是因戊戌政變而欲避禍。

四、「天演」、「進化」二詞在這三個刊物中使用率非常高，令我們有可能詳細審視其使用情況。

「天演」、「進化」二詞同在1897年首次出現在《時務報》。1897年1月，《時務報》第17號刊登了該報日文翻譯員古城貞吉 (Kojō Teikichi, 1866–1949) 譯自日本大阪《朝日報》1896年12月10日的題為〈論社會〉的文章，是一篇以社會進化論為出發點的短論，文章中「進化」一詞出現了七次。至於「天演」，其在《時務報》最早的出現都與梁啟超有關。第一次見於1897年4月第23期梁氏《變法通議三·論學校六》中，他提到嚴譯《天演論》中的話。在這一年「天演」出現了五次，五次都與嚴譯之書有關。

在梁氏三刊出版的十二個年頭裏，「進化」一詞共出現了935次，是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新詞；「天演」則一共出現了147次，也是個常用的新詞。二詞加起來共出現了1,082次，顯示這是個在當時非常流行和有影響力的概念。為便討論，我先把這二詞在十二年裏每年出現的次數表列於下：

年份	天演	進化	二詞使用率比例(%)
1896	0	0	—
1897	5	7	42:58
1898	0	2	—
1899	14	52	21:79
1900	8	70	10:90
1901	12	42	22:78
1902	55	261	17:83
1903	24	158	13:87
1904	11	91	11:89
1905	9	76	11:89
1906	7	162	4:96
1907	2	14	13:87
合計	147	935	14:86

依據這些數字，我們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觀察。在《時務報》時期(1896年8月至1898年8月)，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的學說還是處於初步介紹的階段，嚴譯《天演論》定本正式出版，距離《時務報》結束不到兩個月，梁啟超提及「天演」，源於他與嚴復的交往，其時《天演論》定本仍未正式出版，而梁氏文中「天演」一詞的義界與用法，也完全限制於「天演論」之中。「進化」在1897年的七個用例，全出於古城貞吉同一篇譯文，其義界與用法亦限制於社會達爾文學說。1898年《時務報》

中只見一例，另有一例見於《清議報》。這二例的義界與用法很值得注意。第一例見於《時務報》1898年第63期一篇署名「某君來稿」的題為《論近代政教之源》的文章：

古之人知天下之可為君子，故衣裳鐘鼓之化，達乎上下。今之世料天下之必為小人，故凡食貨選舉職官一切諸政，非以求進化也，防流弊也；非以待馴良也，禦盜賊也；非以禮士夫也，蓄奴隸也。雖然，若此之政，胡為而能行於先王之天下哉！³⁴

文段中的「進化」一詞，其指涉範圍與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的學說並無關係，其語義與今日所言「進步」並無分別。第二例見於《清議報》1898年12月梁啟超的《續變法通議》：

彼洪水前之時，主持世界者為巨鳥大獸。人生其間，其勢固不足與之敵，徒受其殘暴而已。而其最後之戰，人卒能勝禽獸者。則用智與用力之異也。故世界之進化愈盛，則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強。³⁵

這裏所說的「進化」，顯然是植基於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梁氏在1897年用「天演」稱達爾文學說，但他到了日本後馬上改用日本流行的譯詞「進化」。這當然是受到環境轉變的影響。³⁶

從上述論述可見，在1898年以前，梁啟超系報刊中對達爾文一派學說的介紹雖不多，但已同時出現了兩個不同系統的譯名，一是沿用日譯的「進化」，一是新造譯詞的「天演」。而在這樣早的階段，「進化」已逸出了達爾文派學說的拘限，而成了「進步」的同義詞。

1898年以後，「天演」和「進化」開始成了《清議報》中的常見語詞，顯示達爾文學說漸漸在中國學界流行。從《清議報》階段開始，二詞的使用已明顯出現了強弱之勢：「進化」一詞的使用率強於百分之八十，而「天演」的使用弱於百分之二十。踏入《新民叢報》時代，達爾文學說更成為顯學，單以1902年一年計，「天演」、「進化」合共出現了316次，是二詞出現的高峰期，這與該刊特別強調學術、文化，要擔當思想啟蒙者的角色有關。這年二詞的使用比率已發展為17%：83%，這個趨勢愈演愈烈，到了1906年，更出現了4%：96%的懸殊情況。

³⁴ 《時務報》第63期，1898年5月。

³⁵ 《清議報》第1期，1898年12月。

³⁶ 梁啟超初到日本不久，即與日本主張社會進化論的學者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等交往。參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81。

從梁氏三刊觀察所得，「天演」和「進化」二詞的使用有一種很特別的現象：「天演」的147個用例，均指涉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的學說，無一例外；但「進化」的935個用例，其指涉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學說的只有568個，其餘的367個則指涉「進步」、「發展」或「進步發展」。如果只計指涉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學說者，則「天演」、「進化」二詞的比例便是21%：79%。（以最懸殊的1906年計，其比例則修正為6%：94%。）

進化、進步、發展

晚清時期知識分子對達爾文學說有較完整的的認識，應是始於嚴譯《天演論》。《天演論》雖然發揮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卻無助於「天演」一詞在與「進化」競爭作為達爾文學說的固定譯名時取得優勢。

如果我們逐一檢視「天演」一詞在梁氏三刊歷時十二年的一百四十多次的用法，便會發現它固然一直指向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的學說，而且始終是作為名詞來用的，可以說是一個穩定性非常強的詞，作為學術譯名，本來是非常理想的，從中也可見嚴復作為翻譯家的功力與識見。與此相反，「進化」是借用日譯的語詞，它在輸入後不久，便與涵義相近的「進步」、「發展」相混，可以脫離達爾文學說而獨立使用，成為戴有學術桂冠、沾上時髦氣息的「進步」、「發展」的同義詞，可能有人會覺得用起來神氣些。它的詞性也不局限於名詞，而同時可以作動詞和形容詞。這擴大了它的適用場合，也使它的使用率大為提高，而使用率提高又反過來誘使一般人接受它作為達爾文學說的漢語譯名。以1899年到1902年這四年為例，「進化」用作學術語詞（指涉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學說）與用作非學術語詞（作為「進步」、「發展」的同義詞）的次數相當接近，前者是223次，後者是202次。下面列舉的幾條「進化」的用例，均與達爾文學說沒有直接關係，而其義涵均指向「進步」、「發展」：

故泰西官職，恆附以會，聽本職之官或縉紳名士入會，合共研求，故其進化甚驟。（明夷：〈析疆增吏篇〉）

蓋國民既知國家之利害，關切於己，宜其鼓勵精神，以謀政治之進化，而不敢度外視之。（羅普：〈政黨論〉）

歐人知惟變遷乃能進化，故能創造機器，發明新理。（君武：〈彌勒約翰之學說〉）

論者謂就自然的暴動，而加以改良，使之進化，此事抑談何容易耶。所謂改良進化者，不可不取國民心理洗滌而更新之。（飲冰：〈暴動與外國干涉〉）

吾人立于此活動進化之群內，欲盡其義務，完其權利，當益知學法律之要。
(馮邦幹：〈法律平談〉)

若其中有腦力進化之人，或因此一挫，而後來甚能辦理，又安見其氣之墜耶。
(佛蘇：〈論主張競爭者當知法制〉)³⁷

上列這些引文，我在「進化」一詞的前後都故意多引一些文句，目的在顯示其並非在討論達爾文學說，亦與此類學說無涉。從上面這些例句可見，在二十世紀初年，「進化」一詞普遍用作「進步」、「發展」的同義詞，而其褒義的傾向又比這兩個詞更強一些。其中第四條引文尤其值得注意。飲冰(梁啟超)在這裏把「進化」與「改良」相提並論，甚至畫上等號，可見維新派中人急於援引達爾文學說的語詞(即使只是名目上相同的語詞)為維新的理論增加號召力，也傾向於在「天演」與「進化」這兩個詞中選擇一個帶有較強褒義的作為達爾文學說的譯詞。³⁸維新派的宣傳喉舌，在二十世紀初年影響力非常巨大，他們的這種取向，對「天演」與「進化」這兩個詞的消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那幾年，「進化」(evolution)、「進步」(progress)、「發展」(development)這幾個從日本傳進來的的新譯詞，在漢語中曾出現了相當嚴重相混的現象。支持嚴復的雅詞派大可以據此現象而把「進化」定性為譯詞中之劣幣，而把嚴譯的詞義穩定的「天演」定性為譯詞中之良幣。

如果我們把目光鎖定在梁啟超主持的那三個報刊，則三詞中「進步」是出現得最早的一個譯詞，它早在1896年9月便在《時務報》第5號出現在由該報日本譯員古城貞吉譯自《國民報》題為〈美國人觀日本情形記〉的譯文。「進步」本是漢語固有語詞，《漢語大詞典》所提供的在晚清以前已具備的義項有二，即「向前行步」及「人或事物向前發展，比原來好」。³⁹第二義項是從第一義項引申發展出來的。日本人借此詞譯英語progress的抽象含義，即《漢大》所列的第三義項「適合時代要求，對社會發展起促進作用的」。⁴⁰「進步」在晚清是個非常常見的語詞，從1896年到1907年在梁氏三刊中共出現了1,526次，比「進化」多逾六成。

³⁷ 以上引文分見：《新民叢報》第16號，1902年；第40號，1903年；第29號，1903年；第82號，1906年；第4號，1902年；第72號，1905年。

³⁸ 梁系報刊中把改良與進化相提並論甚至劃上等號的例子非常多，除了此例，還有羅普的〈政黨論〉(《新民叢報》第25號，1903年)、仲遙的〈意大利立憲政治之近況〉(《新民叢報》第81號，1906年)、王愷憲的〈日本交通發達考〉(《新民叢報》第93號，1906年)等。

³⁹ 《漢語大詞典》，冊10，頁982。

⁴⁰ 同上注。參潘忠偉：〈近代語詞進步生成史及其話語特徵〉，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頁5。

「發展」這個新詞是古代漢語所無的。它在梁氏三刊中出現較晚，第一次出現是1900年8月在《清議報》第59號刊登的一篇譯自日本報刊的題為〈兩世紀之大觀〉的無署名文章。《漢語大詞典》為「發展」所提供的義項有四，分別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變化的趨勢」、「擴大」、「發揮、施展」。⁴¹ 此詞雖不像「進步」那麼常用，但在三刊中也出現了140次。

《漢大》為「進化」提供的解釋則是「事物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而逐漸變化」。⁴² 從這些釋義看來，它們易於相混是很自然的事。「進步」的新義項與「進化」的義項之間一直存在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關係。⁴³ 「發展」與「進化」的差別，只是「發展」比「進化」多了「事物由小到大」的限制，而「進化」比「發展」也只是多了「逐漸發展」的限制。而「進步」又不離「發展」。它們之間這種千絲萬縷的關係，使它們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間出現了很嚴重的相混交錯的情況，甚至是可以作為同義詞來使用的。這種情況容易使人產生「進化」的涵義比「天演」遠為豐富的錯覺，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令「進化」比「天演」成為更受歡迎的選擇。

雅詞與俗詞

從上述討論可見，「天演」與「進化」是兩個對比很強烈的語詞。另一個觀察它們強烈對比的角度是不少晚清文學研究者都會留意的雅俗問題。嚴復本人不是桐城派中人，但他與晚清時期桐城巨子吳汝綸(1839–1903)往來甚密，在文學的語言問題上與桐城派立場完全一致，而嚴氏翻譯《天演論》的修改過程更與吳汝綸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嚴復在其被視為中國譯界誓章的《天演論》卷首〈譯例言〉中說：

譯事三難：信、達、雅。……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鈞奇哉！⁴⁴

這段論翻譯要用爾雅的文字，不光是論譯詞，但肯定適用於譯詞，不光是概括「天演」一詞翻譯的經驗，但肯定也包括了「天演」一詞翻譯的經驗。他毫不含糊的聲明要「用漢以前字法」、他鄙棄「近世利俗文字」之「抑義就詞」。如果把「天演」與「進化」

⁴¹ 《漢語大詞典》，冊8，頁558。

⁴² 同上注，冊10，頁980。

⁴³ 參潘忠偉：〈近代語詞進步生成史及其話語特徵〉，頁5。

⁴⁴ 《天演論》，頁xi。

二詞套進去，則「天演」在他看來顯然是個爾雅的、是「用漢以前字法」的譯詞，能表達evolution的「精理微言」。相對於雅馴的「天演」，「進化」這個從日本引進的譯詞，是「近世利俗」的，是「抑義就詞」的。如上文所論，嚴氏選用「天」字，是沿用先秦諸子言自然之義，「演」字則根據《說文解字》，確符合他所堅持的「用漢以前字法」的原則。而選用「天演」一詞顯示了他對達爾文學說各種流派的分別的掌握，也就是他所自豪的能表達「精理微言」。至於視日譯新詞為粗俗鄙俚，則是晚清部份士大夫的積習，⁴⁵ 在他們看來，淵雅的「天演」當然是良幣，而來自日本的「進化」則是劣幣。嚴復在選詞雅俗方面完全認同桐城派的立場，他在一些新概念已經有了日語定譯後還要構思自己的一套譯詞，往往是出於追求爾雅之心。

在晚清文學語言(特別是語詞)的雅與俗的角力中，最能掌握時代脈搏，對未來趨勢看得最準確的，也許是黃遵憲了。他在寫於二十一歲(1868年)的〈雜感〉中這樣說：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⁴⁶

黃氏在這裏明確提出詩歌語詞無古今、無雅俗的主張。他在1879年初版的寫於日本的《日本雜事詩》，一百五十四首中，連詩連注用了好幾百個日本新語詞。⁴⁷ 1891年，他在清廷駐倫敦公使館參贊任上寫了〈人境廬詩草序〉，在談到詩歌的語詞及題材時說：「其取材也，自群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牛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⁴⁸ 他在語詞上的兼收並蓄的取向顯然與桐城派南轅北轍。

⁴⁵ 馮天瑜在《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中列舉了張之洞、錫良、鐵良等在清末反對日譯新學語的人物(頁510-12)。江庸在《趨庭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中記載了張之洞反對日本新詞的一段軼聞：「凡奏疏公牘有用新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頁7)這是當時鄙夷日譯新詞為俚俗者的最佳寫照。

⁴⁶ 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42。

⁴⁷ 參蔣英豪，〈《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漢語新詞〉，《漢學研究》第44號(2004年)，頁299-323。

⁴⁸ 《人境廬詩草箋注》，〈自序〉，頁3。

梁啟超在雅俗問題上的取向也很明顯。他的一段經常為文學史書引用的夫子自道式的文字最能說明這種情況：「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至是〔1902年〕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⁴⁹事實上梁啟超對嚴復譯文的淵雅的取向表示不滿，曾直接向嚴氏提出，但卻給嚴復以「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為由擋回去了。⁵⁰

晚清時期語詞的雅俗的角力，是以黃遵憲、梁啟超等人所主張的「俗」的勝利告終的。小說的崛起和白話文的興盛，都宣示了這點。事實上維新派中人就是從「俗」中支取改良的力量的。嚴復在1916年這樣批評梁啟超：「〔梁氏〕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憫然暗殺矣；主破壞，則人又群然爭為破壞矣。……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⁵¹嚴復既了解當時「俗」的力量有多大，則他當然也知道他那典雅的「天演」的譯詞是不可能戰勝那個從日本傳進來的土俗的「進化」的。

結語

1904年，王國維（1877–1927）在《教育世界》雜誌撰〈論新學語之輸入〉，針對性地討論了嚴譯「創造學語」的「天演」與「日本已定之學語」的「進化」二詞的優劣。王氏說：

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無以創造為也。侯官嚴氏，今日以創造學語名者也。嚴氏造語之工者固多，而其不當者亦復不少。茲筆其最著者，如 Evolution 之為「天演」也。……而「天演」之於「進化」，……其對 Evolution……之本義，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國語之知識者，寧俟終朝而決哉。⁵²

⁴⁹ 《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專集34，頁62。

⁵⁰ 嚴復：〈與梁啟超書〉，載《嚴復集》，第3冊，頁516。參袁進：《中國文學觀念的近代變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頁173。應該指出，梁啟超也曾經對一些流行的日語譯詞（如「經濟」、「金融」等）表示不滿，不過他的著眼點是譯詞的準確性。參馮天瑜：〈近代學人對新詞語輸入的反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3期，頁51。

⁵¹ 嚴復：〈與熊純如書〉，載《嚴復集》，第3冊，頁632。早在1897年，嚴復與夏曾佑合作，在天津《國聞報》發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其中曾以進化論的觀點探討小說的重要性。參C. T. Hsia,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 in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ed. Adele Austin Ricket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27。

⁵² 周錫山（編校）：《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112。

王國維早歲曾在上海東文學社從日籍教師藤田豐八 (Fujita Toyohachi, 1869–1929) 及田岡嶺雲 (Taoka Reibun, 1870–1912) 治學，1902年2月得羅振玉 (1866–1940) 資助到日本留學，留日約四五個月，因腳氣病發歸國。⁵³ 他易於接受「日本已定之學語」，是不難理解的。⁵⁴ 在1904年，「天演」與「進化」這兩個詞的「競爭」，勝敗早已有了定論，單以《新民叢報》中的使用頻率計，「天演」是以一比九 (11次對91次) 的巨大比數落敗的。歷史早在王國維留日的那年已宣判了「進化」勝利。

只是王國維認為「天演」不及「進化」，是因為嚴復昧於 evolution 的本義，這可能對嚴復有點不公平。從嚴譯《天演論》來看，他對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人學說之間的分別是掌握得很清楚的，他看重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步」思想，因為他認為這最切合當時中國的需要，但他也知道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等書中有意避開用 evolution，而傾向於用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⁵⁵ 他以「天演」譯 evolution，顯然是考慮到達爾文的因素。他在《天演論》中為「天演」與「進化」二詞的用法劃清界線，也許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王國維的批評，嚴格來說不能算錯，只是他沒能體會嚴氏的苦心。但王國維總結了「創造新學語」與「沿用日本已定之學語」兩條路線競爭的過程，指出「沿用日本已定之學語」才是中國學術未來的方向，歷史證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總結上面的分析與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進化」打敗了「天演」成為 evolution 的標準譯詞，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那幾年的社會環境裏是必然的結果。首先，「進化」這個詞詞性的多元性與詞義的多變性這些對學術名詞本來並不有利的條件，反過來促使了這個詞的流行，為它打敗對手準備了良好的條件。其次，晚清時期尚「俗」的風氣，也使當時人在淵雅的「天演」與相對來說較為俚俗的「進化」之間傾向於選擇通俗的一個。加上當時身負思想啟蒙者重任的梁啟超，在《天演論》剛面世之際，即因戊戌政變而流亡日本，在這個創造「進化」譯詞的國家透過日本學者的翻譯和著述，焚膏繼晷地竭盡新思想傳遞者的責任，而他手上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這兩個最具影響力的報刊，正是協助「進化」打敗「天演」的最大功臣。當然我

⁵³ 參袁英光、劉寅生 (編)：《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7。

⁵⁴ 光是到過日本或接觸過日本人當然不足以構成易於接受日本譯詞的原因。事實上反對日本譯詞最激越的往往是留日學生，撰《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彭文祖便是一例。見馮天瑜：《新語探源》，頁516–18。王國維有很強烈的「文無中外」、「文無文白」、「文無雅俗」的信念，這倒是他易於接受日本譯詞的主要原因。參蔣英豪：《近代文學的世界化——從龔自珍到王國維》(臺北：臺灣書店，1998年)，頁255，268。

⁵⁵ 參田沼：〈進化是進步嗎〉，《自然辯証法通訊》1996年第3期，頁72。

們還不可忘記，「進化」在傳入中國之前，它已在它的出生地打敗了好幾個對手，它是個有來頭的競爭生存者。它在出生地與僑居地的致勝條件都是：它最能適應當時民族危機當前、亟需改革自強的社會環境。

近幾十年通行的現代漢語辭典，如《現代漢語詞典》與《現代漢語規範詞典》，都只收「進化」而沒有收「天演」。⁵⁶綜合性的兼收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語詞的辭典，如《漢語大詞典》與《國語辭典》，則二詞兼備。但這些辭典在列舉「進化」的義項時，卻完全不提「進化」一詞在晚清時期的另一個普遍用法是「進步」、「發展」的同義詞。這是有待填補的漏洞。目前唯一為近代語詞提供詞源的《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在詞典正文中只列「進化」，不列「天演」，也不以「天演」為「副條」、「舊詞」，而其「例證引用文獻」卻又列《天演論》為引用文獻，這也是有待改進的。⁵⁷

⁵⁶ 較具綜合性詞典規模的《現代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年)則收了「天演」，其所舉的例證是魯迅文白夾雜的〈致章廷謙〉函(頁1050)。

⁵⁷ 據《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的「凡例」所列的收詞原則，「天演」是應當列作「進化」的「副詞」的。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凡例」，頁9。應該指出，此書在中國辭典編寫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he Struggle between *Tianyan* and *Jinhua* in Late Qing China

(A Summary)

Chiang Ying-ho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which had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 in almost every aspect in the past century, is known in Chinese as *jinhualun*, a loanword from Meiji Japan. The theory was also known as *tianyanlun*, a term coined by Yan Fu, the prominent translator of classic writings of Western thought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introducers of foreign new thoughts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a time that witnessed the dramatic struggle between *tianyan* and *jinhua* to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translation of “evolution.” Finally *jinhua* was the fittest survivor that won the contest. The competition reflected not only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but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of that perio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ed term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problems concerning parts of speech and lexical meanings of the words in question, the issu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fined” and “vulgar” words, the role of Liang Qichao as the advocate and propagandist of new learnings from the West,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triumph of *jinhua* as the most popular translation of “evolution.”